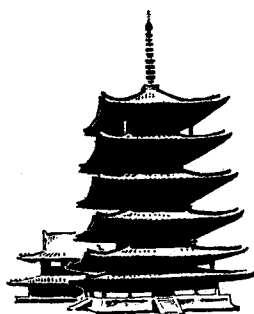


K313/1

日本史论文集

中国日本史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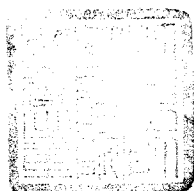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5550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20865550

封面设计：王师颜

日本史论文集

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75印张 403,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700

书号 11002·583 定价 1.70元

编者的话

一九八〇年七月中旬，中国日本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日本史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这本论文集主要是选收这次讨论会上的论文，还收有讨论会后新写的几篇。

这些论文没有包括日本史上所有的重大问题，只是反映了我国的日本史工作者近年来对日本历史研究的关心和重视。论文作者们都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作者们的研究所得，不代表本研究会和出版社。我们的目的，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共同探讨日本历史上的有关问题，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准备条件。

诚恳地盼望读者对这本讨论集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指正。

中国日本史研究会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录

《魏志》倭人传中邪马台国的地理方位辨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张声振 (1)

日本古代部民性质初探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 王金林 (20)

日本平安后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性质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张玉祥 禹硕基 (45)

唐代的日本留学生陕西师范大学 胡锡年 (65)

日本室町时代的“酒屋土仓”和农民运动

.....武汉大学 童云扬 (86)

享保年间中日长崎信牌贸易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任鸿章 (102)

论林子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夏应元 (115)

从《日本书纪》看中国侨人的记载复旦大学 吴 杰 (138)

试论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研究所 伊文成 (155)

简论明治维新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 吕万和 (173)

资产阶级革命与明治维新南开大学 吴廷璆 武安隆 (197)

论日本资产阶级运动吉林大学 汪 森 (222)

幕末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南开大学 王家骅 (248)

试论西乡隆盛北京师范大学 韩文娟 (274)

“殖产兴业”政策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朱守仁 (293)

试论日本近代化的几个问题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刘天纯 (319)

论幸德秋水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研究所	杨孝臣 (350)
日本资本的原始积累及其历史特点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汤重南 (371)
日本法西斯劳工团体初探	南开大学	俞辛焯 (392)
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	北京大学 沈仁安	宋成有 (417)
关于日本当代史研究上的几个问题		
.....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	陈本善 (449)
战后日本经济学工作者对经济高速发展的贡献		
.....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研究所	邹有恒 (470)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		
.....	南京大学	高兴祖 (492)
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	北 京 大 学	李 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马新民 (514)

《魏志》倭人传中邪马台国的地理方位辨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张声振

关于日本古代国家邪马台国地理方位在哪里的争论，延续很久，一直未能取得一致见解。争论的内容是围绕“九州说”和“畿内大和”说展开的。

在日本，这一争论的上限，可上溯至《日本书纪》的刊行。^① 该书的编者以引用《魏志》作注的形式，有意地把卑弥呼女王比作神功皇后，从而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就自然地位于大和了。这可以说是邪马台国在畿内大和说的开端。其后的日本史学家如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松下见林的《异称日本传》、新井白石的《古史通或问》等，都持这一见解。另本居宣长的《馭戎慨言》看法稍有所不同。他认为，《魏志》所载景初、正始年代倭王朝贡之事虽与神功皇后记年相符合，但那时遣使赴魏朝贡的不是在大和朝廷的神功皇后，而是居于九州熊袭地方的某土豪，或者说某一男王，利用威势及于诸韩国的神功皇后英名，冒名顶替地与魏政权发生了朝贡关系。这一看法成为后来日本史学界流行的僭称说的滥觞。其

① 见《日本书纪》卷九，第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年各条注。

后,新井白石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在《外事考察录》一书中认为,邪马台国不在大和而在九州筑后的山门地方,因而可以说他是九州说的创始者,不过,这一见解是在很久以后才为日本史学界所注意。

明治维新后,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传入日本,促进日本史学界对日本古代史的研究,九州说和大和说的争论比以前有所发展,并且,九州说逐渐占有优势。不过,这时的九州说可分为两派。一派史学家有些人受“皇国史观”影响,认为皇纪二千六百年万世一系的日本帝国的古代政权,岂肯向魏政权朝贡,并被纳入中国的册封体系?对皇朝日本说来,领取“亲魏倭王”金印,是不可设想的事。因此,他们成为九州说的拥护者,另一些史学家原来就是本居宣长简称说的拥护者。例如那珂通世在其著作《外交绎史》一书中说,古九州地方素有尊重女酋风气,卑弥呼不过是熊袭地方一女酋,在对魏关系中冒称大和朝廷。^①

另一派继承了新井白石的见解,他们认为《魏志》所载的邪马台国就在北九州,不是什么简称而是实在的北九州的女王国。

如上所述,对邪马台国地理位置的认识分歧很大,但对其所在地点的深入争论,是在1910年。这一年,持九州说的白鸟库吉博士发表了《倭女王卑弥呼考》,持大和说的内藤虎次郎博士发表了《卑弥呼考》。两篇论文意见截然相反,归纳起来,双方的论点大致如下。

白鸟库吉博士认为:

1.《魏志》倭人传关于去邪马台国里程的记述,前后标准不一致,并且所用之里短于一般华里。

2.《日本书纪》的编者以及松下见林等学者认为邪马台国位于大和,是为《魏志》所载一万二千余里的巨大数字所迷惑,没有考虑

① 参见《历史和人物》日文本,1975年4月号,第147页。

其实际距离。

3. 据《魏志》所载里数推测，邪马台国当在不弥国一千三百余里之南，如果是这样，女王国就不会在大和，而在九州。因为《魏志》所载之里程，即使采取当时中国的长里，也只有日本的一町三十四间，^①一千三百余里相当于日本里五十七里。以不弥国位于博多湾附近，从那向南五十七日里则达鹿儿岛县。如果采用中国的短里，从博多湾向南二十六日里也超过了熊本市。这两种里数都不足凭信，不过它足以证明邪马台国不在大和。

4. 从不弥国至大和水行三十日（二次水行日期合计）陆行一日（将一月改为一日）共需三十一日，假设一日走七日里，三十一日可走二百十七日里。不弥国暂定在博多湾附近，由此向南二百十七日里，已到琉球群岛中的大岛，所以用日数计程也不妥。

内藤虎次郎博士认为：

1. 《魏志》的里数是可信的。因为著者在该书中记述从带方郡至不弥国的里数和记述从带方郡至女王国的里数的依据不同，因此，两者不能简单地用同一单位去衡量。

2. 关于水行三十日、陆行一月问题，白鸟博士以及其他史学家都认为一月是一日之误而改之。但是，引用《魏志》的《梁书》、《北史》、《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通志》、《文献通考》等书，没有一部改作一日的，随便地改动古书，令人难于信服。

3. 白鸟博士论文对地名的比拟有过于随便之处。从一支国至末卢国的地点，认为是值嘉岛的美祢良久崎。值嘉岛就是五岛，从那里陆行至伊都国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末卢应在松浦郡名護屋附近。

① 一日里为三十六町，一町为六十间，一间为六尺。一日里约等于三点九公里，近八华里。长里指汉里，短里指周里。参见藤田元春：《上代日中交通史的研究》，第140—141页。

4.如其去考证《魏志》不够确切的里程,不如去考证地名、官名、人名等更为可信些。^①

内藤博士的学生藤田元春根据大量事实考证魏里是日里的四十分之一,按此里计算,不弥国在九州的雫县附近。这一段里程其所以精确,是因为有从光武中元二年(57年)奴国的朝贡使节和以后的倭女王国使节的记录可据,而从不弥国至大和的水路里程,是魏使建中校尉梯儁去大和时的经历记录,故而以日来记程。如果按魏里折算,《魏志》的记述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②

上面较为详细地引述了白鸟和内藤等的争论论点,因为目前关于邪马台国里程方位的争论,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在战后,日本史学界摆脱了旧史观的各种束缚,思想得到解放,研究日见深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本文在研究了中文史料和日本史学界的成果后,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些粗浅的论述,为这一争论添些助燃剂。

二

日本史学界争论的双方在阐述邪马台国家的地理方位时,所依据的史料都是中国的古代文献。因此,要了解争论双方的论点,就需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古代文献。

最早记述卑弥呼女王国家的地理方位的中国史书,大概是鱼豢的《魏略》。日本史学界对《魏略》颇为推崇,认为该书的史料价值较《魏志》为高。但是,鱼豢不是奉旨撰书,他似乎没有机会利用当时国家保存的关于邪马台国的各种档案资料,因而就研究邪马台国来说,《魏略》不可能比《魏志》更为详尽和准确(这点后面还要

① 参见藤田元春:《上代日中交通史的研究》,日文本,第129—131页。

② 参见同上书,第137—155页。

涉及)。但是,从鱼豢可以撰写前人所没有撰写过的倭人传一事可知,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对倭人状况的了解是比较多的。遗憾的是,该书已失传,目前只能读到被其他史书摘引下来的片断文字。因此,陈寿撰述的《三国志·倭人传》,便成为目前研究邪马台国家地理方位的比较完整和极有价值的史书了。

《魏志》比《魏略》的成书时间稍晚,是一部只记述魏朝历史的断代史书。陈寿撰《魏志》,奉有晋武帝旨意,因而有权调阅各种资料。他不仅参考了王沈(chén)按魏帝敕命编纂的《魏书》,而且完全有可能利用魏朝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在这些档案资料中,肯定会有景初二年(238年)以来魏政权与邪马台国五次交往的文献资料。不仅如此,陈寿还为当时名家张华所器重,完全可能因张华而结识优秀的地理学家裴秀,裴秀所绘制的地图,他将有所参考。因而有理由认为,《魏志》中有关卑弥呼女王的邪马台国家的记述,要比《魏略》完整、详尽和准确。这点如把从六朝以至唐宋有机会看到《魏略》的史学家所引用的该书原文,和《魏志》有关情节作一比较就会清楚了(后文将要谈及)。

但有些史学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陈寿是奉敕撰书,在编纂上抱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对某些事件要有所顾忌、有所回避,甚至为了某种需要,对客观事实要有所夸张,并举出《三国志》不撰《西域传》作为例证。某些史学家说,对西域的扩张是曹真、曹爽的业绩,而对东夷的扩张才是司马氏的功劳。陈寿为炫耀司马氏的丰功伟绩,不仅写了东夷传,而且对倭国作了不真实的夸张。^①

我们认为,这种见解对邪马台国地理方位的争论,并无裨益。因为出于政治目的,其所要回避或删削的是某一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与该事件的地点无关。陈寿在《三国志》中撰写《东夷传》,即

^① 参见冈田英弘:《亲魏倭王卑弥呼的正体》一文,见《历史和人物》,1977年6月号,第130—139页。

使象某些史学家所说,是为了炫耀司马氏的功绩,但从裴松之以及其他史学家对《三国志》所作的注中考察,还没有发现出于政治目的故意把国家的地点弄错的事实。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那时的历史学家对日本群岛了解得不够,因而对邪马台国家的地理方位记述得不够准确,这是事实,不过这是认识上的问题,与故意夸张无关。

在《魏志》之前,记述倭国状况的中国史书,除《魏略》外,还有《山海经》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那时,邪马台女王国尚未形成。在《魏志》之后,有范晔的《后汉书·东夷传》和历代史书。《后汉书·东夷传》约晚于《魏志》一百四十年,较其他各代史书更接近于《魏略》和《魏志》。该书关于倭国的记述只比《魏志》多一条光武帝赐倭奴国王印绶的记载,其余情节明显地看到后者的影响。南朝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沈约撰成的《宋书·蛮夷传》倭条中出现了倭王赞,而未提及邪马台国。其后的历代史书关于邪马台国地理方位的记述,除文字略有异同外,没有方位上的差异,并且每一代的史书都把邪马台国作为与当时政权有交往的倭国的历史来记述。所以,从这些史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日本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对日本群岛地理状况的认识也在逐渐明确,大体上到唐宋时代,这一认识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因此应该历史地去研究历代史书关于邪马台国家地理方位的记述,这些记述实际上是中国历代史学家对《魏志》的补充和肯定。

三

《魏志》倭人传中记述了从魏的带方郡到邪马台国的道路里程及其所经过的国家名称。为了便于和其它史书作研究比较,现将有关段落转引于下: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渡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兽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采。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为一支国之误。——引者），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采。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海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鳊，水无深浅，皆沈没取之。东南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漠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咒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南至邪马壹（为臺字之误。——引者）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傍国绝远，不可得详。……此女王境界所尽。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

从上述引文看，这是一段文情并茂的叙述，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只靠传说或想象是撰写不出来的。在《魏志》中，陈寿记述魏使和女王邪马台国使间的交往有多次。例如，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国使难升米等来魏京贡献；正始元年（240年）魏遣带方郡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携印绶赴倭女王国拜假女王；正始四年（243年）倭女王遣使伊声耆、掖邪狗等赴魏京朝贡；正始八年（247年）卑弥呼女王与狗奴国男王不和，女王遣使载斯乌越等去郡说相攻击状，魏遣带方郡塞曹掾史张政等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并

为檄告喻女王。恰值卑弥呼女王死，国内乱，张政滞留不得归，直到新女王壹与立，国中安定，张政始将魏帝檄告喻新女王壹与，并与壹与所遣使掖邪狗同路回京。

在十年中双方使节往返六次，算得上是频繁的交往。特别是张政滞留邪马台国期间，不会不对女王国的情况有所考察，回国后必然要向魏帝作汇报。张政的以及前几次的汇报资料，在二十几年以后陈寿撰写《魏志》时一定会调阅参考，甚至可能走访出使倭国的人。有这样一些客观条件作为依据，陈寿在撰写过程中对于里程的远近或方位的辨别等细节上，或许有所疏漏，但对于大的情节特别是水行或陆行等问题上，不可能发生混乱以至错误的。从上述引文看，陈寿的叙述是层次井然，没有矛盾的。

如果把《魏志》的上述引文和为日本史学家所推崇的《魏略》有关文字作一对比，不能不承认，陈寿对去女王国里程所了解的程度确比鱼豢详尽。且把雍公睿在给《翰苑》作注时引用的《魏略》文字抄录如下：

“从带方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到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无良田，乘船南北市采。南度海至一支国，置官及副同，地方三百里。又度海千余里，至末卢国，人善捕鱼，能浮没水取之。东南五百里，到伊都国，户万余，置官曰尔支，副曰泄漠觚柄渠觚，其国王皆属女王国也。”

“女王之南，又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曰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也。”^①

这段文字是雍公睿为“统女王而列部”一句作注时引用的，目的在于解释魏使赴邪马台国沿途所经各国都辖属于女王国，因而

① 转引自张楚金撰雍公睿注《翰苑》，第三十卷，见《辽海丛书》第八函。

没有继续往下引用，致使我们没有看到至邪马台国的一段文字。但从其另一段注引用了狗奴国的文字看，两者间的内容应该基本一致。对比两段文字，可以看出：第一，两者的地点、方向、里程和官名完全一致，只是在每个国家的有关具体情节上《魏志》较《魏略》详细和充实。由此点推测，两书的著者所掌握的邪马台国地理方位的知识来源应是一个。第二，《魏志》可能利用了魏使的报告书，因而突出了《魏略》所缺少的详细情节。第三，从《魏志》所突出的情节看，与政治倾向性无关，《魏志》无须有意增添，《魏略》也无须故意回避。第四，在倭人传问题上，《魏志》不是《魏略》的抄袭者，因为删繁就简易，在不掌握具体情节下增简为繁难，如果掌握了具体情节，则又不必去抄袭《魏略》。

上述事实说明，《魏志》关于邪马台国里程方位的记述基本可信，不过日本史学家对此提出种种看法。

总括日本史学家的意见，从带方郡至邪马台国间的里程，可分三段研究。

第一段，从带方郡至末卢国。这段里程，由于文字描述极其逼真，日本史学家没有提出疑问。但是一个不大使人注意的问题被忽视了，尽管有的史学家已经提出过意见。这就是方位的问题。在现实里，从北岸狗邪韩国经对马、一支到末卢国的方向，不应记为正南。在中国古代地图中，日本群岛位置的排列是个什么样子，目前已不可考。但是，从《魏志》倭人传记述“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的方位看，有把日本群岛排列为南北狭长的迹象。恰巧，在许多世纪以后，朝鲜的金士衡和李茂，根据元代吴门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明初天台僧清濬的《混一疆理图》等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对日本群岛的排列，正是九州岛在北，本州岛在南。假如中国古代地图也是如此排列的话，就不难理解《魏志》倭人传中“自女王国以北”的方位的记述了。中国史书中方

位记述不够准确这点，还可以从六世纪初文林郎裴世清赴倭都的路程方位得到证明。唐魏征在《隋书·倭人传》中，把隋使裴世清这次行程方位记为“东至一支国”。而其后的方位，从“又东至秦王国”一句看，裴世清的前进方向大体上保持了向东的方位。大约在四百年之后，罗盘针已经广为应用的年代，隋使所记载的罗针方位仍不够准确，虽然纠正了偏南，却又出现偏东的差率。由此可知，《魏志》所载赴女王国里程中的方向，确实有误。

第二段，从末卢国到不弥国。对这一段里程，日本史学家争议最大。持九州说的史学家认为《魏志》中这段里程方位叙述得比较混乱。从方位说，又东又南，不好理解；从里程说，本段里程与全程比，很短，说明邪马台国不可能超出北九州的范围。对这一段里程，除前述之白鸟库吉博士看法外，还有其他的看法，诸如榎一雄氏的放射性里程说。榎氏认为《魏志》所载本段里程，不是一条点点相衔接的路线，而是一条以伊都国为中心通向各国的放射形路线。^①

我们认为，解决本段里程首先是方向问题。正如前述，在海行时方位已经偏南，上陆之后，从末卢国起，方位的记述大体上按前一段同一偏率向南偏离。所以《隋书》便纠正为东。其次，应把日本史学界对北九州所作的考古成果，和《魏志》的记述互作印证。目前，日本史学界对末卢国大致在今之松浦一带、伊都国大致在今福冈县前原町一带、奴国大致在今福冈博多湾一带，有一致看法。如果日本史学界的看法不错，那么据《魏志》，这三个国家是本段里程中四个互相衔接的国家中的前三个。第四个国家不弥国的位置，目前虽尚没确定，但它距离奴国只有“百里”，而且是个海岸国家。因为下一段主要是船行了。由此可见，《魏志》所载的本段里程路线，

① 参见《历史和人物》，1975年4月号第41页。

主要是由海岸国家末卢通过伊都、奴国，再到达海岸国家不弥，换句话说，本段路线的目的在于穿过北九州。这样一来，不仅方位的问题解决了，而且也排除了关于里程的其他说法。

第三段，从不弥国至邪马台女王国。持北九州说的日本史学家，对这一段里程持否定态度。这是弄不清上一段里程的必然结果。他们由于主观认为邪马台国家应在北九州的某处，因而对从不弥国开始的水行里程无法理解，只好寻找一些理由去否定它。例如，有的史学家说，驻在伊都国的“一大率”拒绝魏使去投马国，致使魏使没能到达邪马台国。魏使未能完成使命，回国后为了开脱罪责，故意编造一段子虚乌有的路程。^①有的说在去大和朝廷的途中某一地名的发音类似介于不弥国和邪马台国中间的投马国的发音，陈寿在记述里程中没有弄清发生了混乱。^②这实际上仍是僭称说。有的说，“陆行一月”的记述即使从大和说考虑，也找不到需要陆行一个月才能到达大和朝廷的港口。^③

对第二段里程的不同认识，是产生上述各种看法的根本原因。他们如果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承认不弥国是一个海岸国家，由那里船行至邪马台国，那么，女王国必然不在九州而在近畿一带了。而这点是他们所不愿承认的。

这里确实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那就是，从不弥国到邪马台国的里程只记以日数而不记以里程。对此问题持大和说的史学家认为，魏使不了解具体里程只记以日数。^④这种认识也不完全。

《魏志》中没有说明不以里数记程的原因。但裴松之作注时引《魏略》一段话：“其俗不知正岁四时，但记春耕秋收为年纪”。这使

① 参见牧健二：《日本的原始国家》，日文本，1968年。

② 参见桥本增吉：《从东洋史看日本上古史的研究》，1956年。

③ 参见白鸟库吉：《卑弥呼问题的解决》，1948年。

④ 参见藤田元春：《上代日中交通史的研究》，日文本，第155页。